

建構·敷演·拓變——唐宋「詩史」說演進的再審視

葉汝駿*

(收稿日期：108年10月16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11月10日)

提要

本文利用劉若愚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上優化設計的所謂適於中國文論的闡釋模型，以重新審視唐宋「詩史」說之建構、敷演和拓變的具體情形。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的精要論述中，已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宇宙、作家、作品和讀者全部四個要素，其中宇宙與作家之關係是其關懷的最主要面向，由此奠定了「事」在「詩史」說中的核心地位；《本事詩》在作家與作品關係方面的論述，則開出了對「敘」的面向的關注；至於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討論，又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本事詩》完成了「詩史」說的基型建構，隨後經由宋人的深度敷演和有力拓變，「詩史」說獲得了躋身中國古代文論之基本議題的可能。

關鍵詞：詩史、杜甫、《本事詩》、唐代、宋代、劉若愚

*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詩史」二字連用之例，首見於《宋書·謝靈運傳》，¹然其意涵僅止於對詩歌與歷史之關係作一般意義的描述，即所謂「詩歌的歷史」。²在中國的傳統文獻中，此一用法出現頻率頗高，事實上代表了「詩史」一詞主要的、常見的意涵。但「主要」並不代表重要，「常見」也不一定意味著特點鮮明。相反，正因為這一初發意涵儘止於一般意義的描述，未曾施以特殊的限定，故未能敷演為一種獨具鮮明特色的概念。是知，一個語詞若要擁有成為「術語」、「概念」以至「範疇」的可能，³需在符合基本邏輯的基礎上，作超越一般意義的描述。「詩史」這一語詞，後來之所以超越了「詩歌的歷史」這種基於普通邏輯的界義，而升格為中國古典文論中的一個極具鮮明特色的概念——所謂「用『詩』寫成的『史』」、「作為『史』的『詩』」，⁴正是由於其後來在描述邏輯或策略上發生了突破，故能一再引起後人的追索與討論。如今吾人能在浩瀚的傳統文獻中，較為容易地將「詩歌的歷史」——此種一般意義上的「詩史」與後來具備特殊意涵的「詩史」區隔開來，也正是因為於後者具備了鮮明的理論品格，從而使吾人在觀念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認識：尋常的「詩史」之外，別有一種特殊的「詩史」。

前一種「詩史」是基於普通邏輯上的界義，已如前述，而後一種「詩史」在文獻中則首見於晚唐孟啟⁵（生卒年不詳，875年進士）的《本事詩》。⁶凡談及「詩史」問題，必

¹ 《宋書·謝靈運傳》：「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南朝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冊，卷67，頁1779。

² 多數學者贊同此觀點。如廖師棟標以其為「前人的詩作」，見廖棟標：〈構杌說——《楚辭》的歷史學〉，《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181。另郭紹虞先生認為此處的「詩史」應訓為「詩歌中與歷史有關的典故」，見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冊，頁220。

³ 關於「術語」、「概念」與「範疇」的定義與辨析，參見汪湧豪：〈範疇的哲學定義〉，《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其體系》（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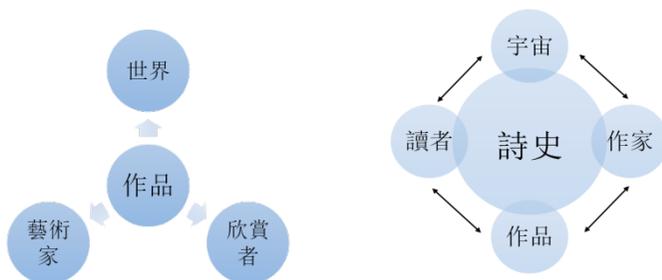
⁴ 日·淺見洋二：〈「詩史」說新考——以白居易〈和答詩·和陽城驛〉為中心〉，收入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35。

⁵ 關於孟啟之名，歷來有「榮」和「啟」二說。《新唐書·藝文志》、顧元慶輯顧氏文房小說本《本事詩》、《全唐文》卷817、毛晉輯津逮秘書本《本事詩》俱載為「孟啟」。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20、《四庫全書總目》則認為「啟」當為「榮」。然據洛陽市白馬寺鎮帽郭村出土的孟家四方墓誌顯示，歷代文獻中沿用的「榮」之名實誤，其名當為「啟」。參見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啟家世生平考》，收入項楚主編：《新國學》第6卷（成都：巴蜀書社，2006年），頁1-17。

⁶ 此一具有特殊意涵的「詩史」之名首見於晚唐孟啟的《本事詩》。但這並非代表孟啟之前沒有「承認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歌具有歷史記述功能的觀念」。此論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335-354。

定溯源至《本事詩》，儘管前賢對此已作了豐富而深入的釋讀，⁷但主要的關懷往往聚焦於「詩史」說內涵的形成及演化上。檢視可繼續研究的方式，除了十分困難的新材料之發現、考辨及運用外，較為可行的進路是轉換觀看的方式，採用一種新視角對這些近乎成熟的議題進行再度審視。循此，本文將研究視角轉換至前賢鮮少關注的「詩史」這種言說方式或言說策略之本身，嘗試揭窺「詩史」說在形成初期具體的建構、敷演和拓變的內在理路。

美國學者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 1912-2015）在 1953 年出版的《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一書中提出藝術批評的座標問題，並設計了一個以「作品」為中心的藝術理論闡釋模型（見下文左圖）。⁸不過這一闡釋模型似乎並不能全然相容中國的一些文學批評，於是在 1975 年，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James J. Y. Liu, 1926-1986）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上，重新優化設計了這一闡釋模型使之能相容於中國的文學批評，同時更改了部分要素的名稱以專門適應於文學方面的批評（見下文右圖，去掉中間的「詩史」）。



⁷ 相關重要研究成果如廖棟樑：〈試論孟榮《本事詩》〉，《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4 期（1994 年 9 月），頁 176-178。日·內山知也：〈孟啟與本事詩〉，《隋唐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424-433。日·淺見洋二：〈「詩史」說新考——以白居易〈和答詩·和陽城驛〉為中心〉、〈關於詩與「本事」、「本意」以及「詩識」——論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接受過程中文本與語境之關係〉，收入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5-354、355-369。張暉：〈「詩史」的最初形態：重讀《本事詩》〉，《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2016 年），頁 13-28。龔方琴：〈重讀《本事詩》「李白」條——試論與杜甫相關的若干問題〉，《杜甫研究學刊》2010 年第 4 期（2010 年 11 月），頁 25-31。吳懷東：〈《本事詩》「詩史」說與中晚唐學術脈動〉，《文史哲》2018 年第 4 期（2018 年 7 月），頁 140-151。

⁸ 艾布拉姆斯認為任何一件藝術品都要涉及作品、世界、藝術家、欣賞者四個要素。其以作品即闡釋的對象作為座標中心，將世界、藝術家和欣賞者這三個要素與之安排成一個三角形（見正文左圖）。其發現所有的（西方）藝術理論都只明顯趨向四個要素之一，趨向世界、欣賞者、藝術家者分別形成模仿理論、實用理論和表現理論，此三者皆與作品密切關聯，最為常見；還有一種僅趨向作品本身——將作品視作自足體來分析的客觀理論，較為少見。參見美·艾布拉姆斯著，鄺稚牛等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40。原著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 1953 年出版。

從上圖可見，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艾布拉姆斯的闡釋模型是靜態單向的發散型架構，而劉氏則將其改為動態循環的封閉型架構。劉氏認為藝術過程分為可以雙向運行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宇宙影響作家，作家反應宇宙；第二階段，作家在受影響之後創製作品；第三階段，作品影響讀者；第四階段，讀者對宇宙的反应因接觸作品的經驗而改變。同時，由於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受到外在宇宙的影響，且由於反應作品，讀者與作家的心靈發生接觸而嘗試再度捕捉作家對宇宙的反应，因此反過來亦能構成一個循環。⁹劉若愚利用這一闡釋模型將中國文學理論分為屬於第一階段的形上理論、決定理論，屬於第二階段的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屬於第三階段的審美理論和屬於第四階段的實用理論等六種類型。

然劉若愚的闡釋模型亦非完美，其也坦承這只是一個簡略的圖表。即如本文所探討的「詩史」說，因其內涵十分豐富且充滿動態的變化，很難將其確切歸為上述六種理論類型之一。劉氏亦承認各種理論的相互糾纏和影響，故其在《中國文學理論》的最後特設了一章〈相互影響與綜合〉。不過，由於西方學術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必為各種概念尋得一個終極的屬性，但這似乎並不適合中國的情形。雖然劉氏對此一點存有警覺，但上述架構仍無法完美化解相關的牴牾。儘管本文擬基於由劉氏重新設計的所謂適合中國的文論闡釋模型，以重新審視唐宋「詩史」說的相關意涵，然亦並非全盤採用劉氏理論。筆者以為劉氏闡釋模型最具借鑒之處在於四要素和四階段的分析，這有助於吾人能夠更細緻入微地分析「詩史」說在不同時代、不同學者那裡的不同解讀，從而使得各時代的「詩史」說能在一種自洽的理解框架中各安其位而生一統緒，同時發顯其中長久以來被遮蔽的部分。

二、建構「詩史」——《本事詩》所見「詩史」說的文本密碼

《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¹⁰從「當時號為『詩史』」的說法來看，此種有別於普通邏輯界義的「詩史」之出現，或不能輕率定於晚唐，至少存在著坐落於從杜甫（712-770）生前迄於孟啟撰《本事詩》這一時段內的各種可能。但由於現存文獻之不足徵，具體情形已難以考訂，本文對此暫不討論。《本事詩》這一則論述更重要的意義，或許在於提示吾人可以透過其來「瞭解『詩史』一語的初始意義」。¹¹又由於此說在今存孟啟以降的晚唐

⁹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12-18。

¹⁰ 唐·孟啟：《本事詩》，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6。

¹¹ 王運熙、楊明：《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738。

五代文獻中不見任何嗣響，故對《本事詩》中這幾句話的真實意涵的釋讀及對其價值的正確認識，對於釐清「詩史」說的發展脈絡而言是至關重要的。不過，《本事詩》在這幾句論述之前還有很長的篇幅是在敘寫李白的事跡，從文本語境來看，上引這幾句關於「詩史」說的話語實可謂無關輕重。但若從「詩史」說的發展脈絡來追索，這寥寥數語卻是後世諸多言論的祖型。¹²然而，據張暉先生（1977-2013）的研究，「在《本事詩》之後，『詩史』說馬上就從李白故事中脫離而出了。整個宋代……似乎沒有人注意到『詩史』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是依附在李白故事之上。不過這種忽視，反而使得『詩史』概念在宋代得到自由充分地發展和演變」。¹³職是，即使孟啟在撰述這則材料上或有其精心安排之處，但作者的意圖和讀者的接受有時卻並不同步，後世的「詩史」說甚至可以說幾乎都是對《本事詩》這則材料的某種「斷章取義」。所以在廓清上述事實的情形下，本文將研究的目光聚焦在這幾句之中，應是可行的。那麼，這寥寥六句二十九字，還隱藏著哪些未曾揭開的文本密碼？

基於劉氏提供的闡釋模型，以下對《本事詩》中這則材料的分析思路為：首先確定四個要素之具體所指，然後判斷其趨向或專注於四個藝術構造階段中的哪一階段（此處有二點需說明：一是若涉及多個階段，可能要辨其主次；二是本文採用「假設——檢證」的分析方法，即以劉氏提出的四個階段為分析框架，先假設研究對象涉及全部四個階段，再逐一進行檢證，由此得出研究對象所趨向的主要階段），接著分析各階段中兩個要素間互動運行的具體情形，最後總結出《本事詩》建構「詩史」說之基型的特點，並提示其對後世的影響。

劉若愚所建立的闡釋架構「是由一件文藝作品的各種情況必然含有的四個要素間的相互關係所構成的，亦即：世界、作家、作品以及讀者」。¹⁴儘管對於一個理論之價值的衡量，並非依據它所涉及之要素的齊全程度，但如若一個理論所牽涉之要素越多，那麼其在建構上的複雜性也將增加。《本事詩》這則簡練的材料中所構築的「詩史」說的原型，實已涉及到了關乎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這表明了「詩史」說在發生之初便自具一種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首先看其中「宇宙」的部分，各種文藝理論中的「宇宙」不盡相同，須研判其具體指向的是物質世界、人類社會，還是某種更高的宇宙？從《本事詩》的論述來看，它的「宇宙」顯然是指人類社會，若轉換為後世「詩史」說的常用話語，即所謂的「事」。具言之，是指「祿山之難」這一國家時事以及杜甫「流離隴蜀」這一個

¹² 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 338-341。

¹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23。

¹⁴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307。

人事件。再看「作家」，《本事詩》在這裡專指杜甫。至於「作品」，從敘述邏輯來看，是指反映國家時事與個人事件的作品（不過根據該則文獻的前面部分，具體特指杜甫懷李白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孟啟視之為典型的「詩史」作品）。最後看「讀者」，可以從「故當時號為『詩史』」這句中透露消息，根據句子前後敘述邏輯，再結合杜甫的個性及其生前寂寞無名的事實來看，無論「當時」具體是指何時，¹⁵「號為『詩史』」這句話所省略的主語，當非杜甫本人。儘管《本事詩》明確談論「詩史」的文字只有這寥寥二十九字，孟啟本人也不一定有意建構理論的自覺，但據劉氏提供的闡釋架構的檢視，它實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關乎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故這樣的複雜性不得不引起吾人的重視。那麼，《本事詩》是如何安排這四個要素的闡釋邏輯的呢？其最關注的又是四個階段中的哪一階段？其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又是什麼？以下先假定《本事詩》的論述涉及到了藝術過程的全部四個階段，並嘗試透過各個階段的具體分析，以探蹟其真正的關懷之處。

（一）《本事詩》論「宇宙」與「作家」之關係

首先看第一階段的「宇宙」與「作家」之關係。對應到具體文本之中，是指「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這幾句。需說明的是，「畢陳於詩」這句其實兼涉屬於第一階段的「作家反應宇宙」和屬於第二階段的「作家創造作品」，又更主要地是指向後者，顯然孟啟在這裡沒有區隔二者，而是將反應的過程和結果直接統合論述了（事實上有時難以將反應的過程、結果，或者說作品的未發、已發狀態截然分開討論），這裡為敘述方便仍將該句納入第一階段進行考察。從敘述邏輯來看，這是一個由兩組存在因果關係的句子嵌套形成的句群，頂層的因果關係為：因為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所以他纔能將上述經歷「畢陳於詩」（此處毋須糾結作品是未發或已發、在心或在紙）。同時，頂層因果關係之中的「因」，其內部也嵌套著一對因果關係：因為杜甫「逢祿山之難」，所以纔會「流離隴蜀」。

那麼，以上的敘述邏輯意味著什麼？一則，《本事詩》十分關注「宇宙」對「作家」的影響。這種影響或表現於「作家」外在的方面，從文本語境來看，即國族大事往往影響甚至決定「作家」個體的遭際；或表現於「作家」內在的方面，即由國族大事影響甚至決定的個人遭際構成了所謂「宇宙」的部分，其對「作家」的思想情感勢必造成顯著影響，

¹⁵ 如韓經太先生認為「當時」是指「中唐貞元、元和之際」。參見韓經太：〈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向〉，《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1999年5月），頁169-172。

從而引發其詩思與創作。若以劉氏的觀點來看，這種情形可視為一種「決定理論」。後世「詩史」所關懷的核心——「事」，實即劉氏所談的「宇宙」或「世界」的重要部分，可以說《本事詩》的這一點關懷奠定了後世「詩史」說對「事」的特為看重。

二則，《本事詩》在「宇宙」的部分又特別區隔出了國族大事與個人遭際這兩大面向，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確認了前者的決定性地位。¹⁶何以見之？竊以為，文本中的「逢」字或點出了關鍵，其揭示出的是一種個體的「被動性」，具言之，即國族的命運必然影響甚至決定「作家」個體的命運。反過來說，要形成所謂的「詩史」，詩人必然是被一種宏大的、個體所不能左右的外在力量所支配。換言之，「國家不幸詩人幸」，「詩史」之塑成，或需一種負面意義的「天時」。也正因為此一點，那些被稱為「詩史」的作品必定多少蘊藏著悲劇的意味。《本事詩》的這一點關懷對後世「詩史」說亦形成了深刻影響：一方面開出了以「詩」為「一國之史」和以「詩」為「一人之史」這兩種基本觀點；另一方面，「詩史」作品還能反映個人事跡，遠能見證國族大事，顯示了這類作品強大的思想內容張力，由此帶來的是詩歌品質的提升；再一方面，由於對國族大事的特為強調，使得後世的「詩史」說不免帶上了道德關懷甚至審判的意味，充滿了價值論的色彩，進一步的影響則是：「凡是在詩歌史上被稱為『詩史』的作品幾乎都被視為是偉大的。」¹⁷

三則，在彰顯「宇宙」的強大支配力與揭示「作家」的「被動性」的同時，《本事詩》也大力強調了「作家」反應「宇宙」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一方面表現在「作家」可以將對「宇宙」的反應「畢陳於詩」，以詩的形式記錄事實、抒發情感；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如何陳於詩」，這一點涉及到「作家」與「作品」的關係，容後再談。《本事詩》對「作家」的「能動性」的強調，對後世的影響有兩點：一方面，若與前一點配合來說，恐怕就在於時危世艱之際，「詩史」觀念往往以道德感為號召，呼喚著有識之士以詩歌的形式去記錄、表現外在的「宇宙」，這也是緣何「詩史」的適用範圍僅局限于宋末、明末清初這些「衰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由於強調了「作家」的「能動性」，勢必又會帶出個體「抒情」的問題，引發後世對「詩史」說之「敘事」與「抒情」關係的討論。

¹⁶ 淺見洋二先生指出「在通過『詩史』記錄下來的『事』之中，孟啟認為處於最核心位置的是個人事跡」，參見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341。此觀點與筆者並不抵牾，只是討論角度不同。根據筆者前面的論述，國族大事是透過個人經歷的中介而對詩人的內在產生影響，且國族大事和個人經歷又共同組成了影響「作家」的「宇宙」。強調國族大事的決定性是從這些「事」本身的客觀邏輯層次而言；而淺見氏指出個人事跡的核心性，則是強調各種「事」的記述需最終以人為依託。

¹⁷ 張暉：〈中國的「詩史」傳統〉，《無聲無光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5。

(二) 《本事詩》論「作家」與「作品」之關係

第二階段關涉的是「作家」與「作品」之關係。由於「作家」充當「宇宙」與「作品」的中介，故對應到文本之中，這一藝術構造階段具體是指「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這幾句。與前述「畢陳於詩」兼涉一、二階段的情形類似，「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亦兼涉二、三階段。何以言之？因為從「作家」角度來看，此八字可視為一種傾向於規範性的技巧理論；但若從「讀者」角度來看，此八字就應視作一種審美理論，此時它就傾向於描述性。亦即，與前文提到的「反應的過程與結果」一樣，這裡的技巧理論和審美理論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只不過是為了分析的需要而從不同角度將其刻意區隔開來罷了。從語意來看，這裡無法完全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完全視作「讀者」的審美總結，也無法單純視作杜甫自覺的敘事技巧，故不如存其兩可。亦即：當截取「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意段時，視後八字為杜甫的技巧理論，屬第二階段；截取「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為一個意義段落時，視前八字為「讀者」的審美理論，屬第三階段。當然，上述的分辨是建築在以「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為美學範疇的基礎之上的，誠然此八字亦是就杜甫作品的內容而言，但筆者以為其中實際隱含了鮮明的美學觀念。因為對「事」的擇選、裁剪與加工本身就是一個關涉美學觀念的問題，作家可以選擇全盤如實呈現，也可以截取片段進行藝術加工，而從「至隱」等字眼可見，杜甫的這種敘述藝術，顯然是將宏大的、隱微的「事」畢陳於詩中而無所遺漏，可知此八字實揭示出了早期「詩史」說的敘述藝術取向。

明乎以上，再從敘述邏輯來看，聯繫整體文本而言，這幾句是在談「作家」反應「宇宙」的結果；單就這幾句而言，「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就是對「作品」特徵的描述，可視作「畢陳於詩」之「詩」的進一步補充說明，換言之，這是在具體申說「如何陳於詩」的問題（當然，這一點的前提是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視作杜甫自覺的創作技巧或敘事藝術）。而「如何陳於詩」，本質上就是要談敘事藝術的問題。那麼，《本事詩》所標舉的是怎樣一種敘事藝術？孟啟在這裡並未額外多談，然此八字實已透露出了豐富的消息。一方面，《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春秋》推見至隱。」¹⁸從「推見至隱」的語源來看，孟啟具體指出了杜詩採用類似《春秋》的敘述策略，即史家以一字寓褒貶、微婉顯晦的表現方式，其原理類同詩歌創作中的比興手法；另一方面，「殆無遺事」（另「畢陳於詩」也可納為輔證）雖強調的是訊息全部披露之後的溝通效果，但這種效果既可藉助比興也可以透過賦法來實現，且披露全部訊息這一行為本身就暗含著通往賦化鋪陳之表現方式的可能

¹⁸ 漢·司馬遷：《史記》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3073。

性，儘管孟啟在其表述邏輯中肯定了「詩史」作品宜於比興的徑路，但實際也為賦化鋪陳的可能留下了一道理論的縫隙。

至於《本事詩》以上論述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大抵可歸為兩點。一則，《本事詩》似乎申明了這樣一種觀念：優秀的「詩史」作品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它以「事」為本，但同時也呼喚著藝術的加工與配合。如果可以冒昧將「詩史」說簡化為「敘事」的問題，¹⁹並進一步分解為「敘」和「事」的問題的話，那麼，這一部分顯然是在談「敘」的面向。前文已言，「如何陳於詩」構成了「作家」「能動性」的重要部分，這充分說明了敘事藝術在「詩史」說中的重要地位，儘管孟啟對此惜墨如金，但後世「詩史」說對這一點可謂饒有興趣。不過，以「事」為主，「敘」為「事」服務的基本傾向已在《本事詩》中得以奠定。二則，後世的「詩史」說顯然找到了孟啟關於「殆無遺事」這一呈現效果之實現方式上的理論縫隙，進而引發了「詩史」作品究竟宜於比興還是宜於賦法來表現的熱烈討論，同時也牽連出了《春秋》筆法等其他敘述藝術方面的問題。

（三）《本事詩》論「作品」與「讀者」之關係

第三階段，即「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問題。從《本事詩》這則文字的整體敘述邏輯來看，其呈現出的是一種層層遞進的因果關係，若補足這些關係詞和省略的部分，其完整語意或可這樣表達：杜甫因為「逢祿山之難」，所以「流離隴蜀」。又因為上述的經歷對詩人的身心產生了顯著影響，故杜甫將之「畢陳於詩」，這些作品的特點是「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正因為這些「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詩歌作品記錄或反映了由「祿山之難」引發的個人遭際的改變以及個人內心情思的變遷，所以當時之人將杜甫的這些作品稱作「詩史」。梳理了這則文字的語意邏輯關係，再來看《本事詩》所論的「作品」與「讀者」之關係，是以可知：首先是這種由「作家」反應「宇宙」而創造的「作品」對「讀者」產生了影響（若將「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視作讀者閱讀作品後的審美經驗總結的話），反過來，又由於「讀者」透過這些「作品」對杜甫的心靈發生接觸而再度嘗試捕捉杜甫對「宇宙」的反應，從而建構出了這種名為「詩史」的觀念。一言以蔽之，所謂「詩史」，實際上是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後世的「詩史」說皆可視作「讀者」不斷反饋的產物。

¹⁹ 宋代李復、魏泰、蔡居厚等人即提出「詩史」的意涵為「敘事」。今人如陳文華先生亦將「詩史」的中心概念定為「敘事」：「『詩史』之基本概念，即在『敘事』，能以詩為敘事之工具，亦詩亦史，即謂之『詩史』。」參見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243。

這一點對後世「詩史」說的影響大抵有兩方面。一則，它開出了後世「詩史」說對「作家」與「讀者」的雙重關注，具言之，前者表現為對「作家」人格、膽識、才學、修養、技巧等方面的高度關注；至於後者，則表現為「詩史」這種觀念在後世分化出了豐富的闡釋，不同的「讀者」建構出了不同意涵的「詩史」說。二則，由於「讀者」反應的千差萬別，遂引起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現象（又由具體情形的不同牽涉到第三和第四階段，詳後）。

（四）《本事詩》論「讀者」與「宇宙」之關係

劉氏闡釋模型中的第四個階段涉及「讀者」與「宇宙」之關係，這一點在《本事詩》中並沒有明確論述。但其中關於「宇宙」之於「讀者」的關係，若結合前一點「作品」與「讀者」的關係來看，或能作一點推論：「詩史」是一種由「讀者」建構起來的觀念，這些建構者——「讀者」，必定受到了相似「宇宙」的相似影響，因此纔會與這些由特定「作家」創造的、反映相似「宇宙」的、「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詩歌「作品」產生共鳴。當然這些推想並無文本上的標記。至於「讀者」之於「宇宙」的方面，《本事詩》中無跡可尋，不宜過度解讀。但這一點留白，恰為後世的「詩史」說留下了豐富的闡釋空間。那麼，《本事詩》在這一階段上論述的缺失，是否會影響整體闡釋架構的自洽？按劉氏的觀點，一個理論並非要具備全部四個階段，反而是要明顯傾向於其中的某一階段。《本事詩》的情形印證了這一點——儘管《本事詩》涉及到了全部四個要素，但它卻明顯傾向於描述「宇宙」和「作家」關係的第一階段。

綜上所言，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惜墨如金的論述中，卻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且其對四個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言說也具有一種極強的自洽性，這充分表現出一種力求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此一點提醒吾人：不宜低估《本事詩》中的這則材料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常僅視其為「詩史」說的雛形）。《本事詩》所建構的「詩史」說明顯涉及到的是前三個藝術構造階段（即「宇宙」與「作家」、「作家」與「作品」、「作品」與「讀者」）。其中第一階段纔是《本事詩》最主要的關懷之所在，由此奠定了「事」在後世「詩史」說中的核心地位；第二階段的論述開出了後世「詩史」說對於「敘」的面向的關注；而第三階段的論述則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以《本事詩》為中心的早期「詩史」說實已開出了後世「詩史」說的基本面向，後人的諸多討論早已在其中埋下了伏筆。「詩史」說雖在唐五代僅見《本事詩》一則孤例，但在隨後的宋代卻成為了引起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至於

宋人如何展開「詩史」說的相關問題，有了上述對《本事詩》相關分析的參照，亦不難爬梳其中演進之脈絡，窺探其敷演和拓變的具體進程了。

三、敷演與拓變——宋代「詩史」說的再審視

杜甫經典地位在宋代的確立，²⁰引發了宋代杜詩學的繁榮。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宋人熱衷圍繞杜甫發表有關「詩史」的意見，正如論者所言：「宋人最服膺唐人的詩史說，評論中運用最多，並有所發展。」²¹前賢對宋代「詩史」說已作了充分地爬梳，如楊松年先生的〈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一文將宋人紛繁的「詩史」說歸為九個類別，²²此分類是作者對宋人「詩史」說進行較為全面調查後得出的結論，然亦存在分類稍繁、分析過少、未注重「詩史」說各種意涵前後發展脈絡等缺憾，另外在材料擇取的標準上似過於寬泛，許多材料只是對杜甫的一般評價而未與「詩史」聯結。張暉先生在《中國的「詩史」傳統》第二章〈以詮釋杜詩為中心的宋代「詩史」說〉中，將兩宋三百餘年間的「詩史」說劃分為北宋仁宗末年到哲宗初年（1060-1090）、北宋徽宗與欽宗朝（1101-1127）以及南宋直至元初（1127-1286）三階段，分別拈出各時段的重要論述，並指出「詩史」說的主要內涵在北宋已基本誕生，然雖豐富卻遊移，進入南宋後又逐漸收窄於「春秋筆法」與「知人論世」兩者的事實。²³以上具代表性的兩家論述，分別從共時和歷時之視角分析了宋代「詩史」說開展之諸面向，互有見地。筆者嘗試運用劉若愚提出的文論闡釋模型，以《本事詩》所見「詩史」說基點，將宋人豐富的「詩史」說與之進行對照，以探知宋人如何對「詩史」說的早期意涵進行敷演和拓變。下文所論宋代的部分採共時之視角，然又與唐人觀念相對照以見其變遷，因此亦是一種歷時之考察。

²⁰ 參見程杰：〈陶、杜典範意義的發現及宋詩審美意識的形成〉，《北宋詩文革新研究》第20章（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570-587。

²¹ 劉文剛：《杜甫學史》（成都：巴蜀書社，2012年），頁45。

²² 楊松年先生將宋人「詩史」說歸併為九類：「以杜詩善於反映、敘述那一時代的政事」；「以杜詩所敘述的事物或描繪的情景，最能實錄」；「以杜詩用典未嘗失誤」；「以杜詩煉句下字，往往超詣」；「以杜詩寓褒貶之意，具春秋筆法」；「以杜詩備於眾體」；「以杜詩詩情誠實」；「以杜詩有年月地理本末之類」；「直稱杜甫其人或其詩作為『詩史』」。參見楊松年：〈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該文最早發表於1983年出版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11種；後收入楊松年：《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香港：三聯書店，1987年），頁127-162，此版本將原題〈杜詩為詩史說評析〉改為〈宋人稱杜詩為詩史說評析〉，對各類的文字表述進行微調，並刪去原第十類「以杜詩歌行以『嗚呼』作結為詩史」。

²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29-88。

(一) 從「宇宙」與「作家」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宇宙」與「作家」之關係是早期「詩史」說關懷的最主要面向，也是引發「詩史」說的邏輯起點。儘管「詩史」說是一種由「讀者」建構起來的觀念，但它並不是以「讀者」為中心而是以「作家」為中心立論的（至少代表了後來主流的情形）。「宇宙」與「作家」之關係亦是宋人討論「詩史」的最主要面向，總的情形是：宋人一方面大幅細化了「宇宙」影響「作家」這方面的討論；另一方面，「作家」反應「宇宙」的部分更成為宋人關注的焦點。具言之，表現為以下四個面向。

1. 對「事」的影響力之確認及對「事」的具體類型之拓展

宋人延承了早期「詩史」說對「宇宙」即「事」之影響特為看重的觀念，一方面繼續確認「宇宙」之影響是引發「作家」創造「詩史」作品之原因所在，如潘鏞（生卒年不詳，約1131年前在世）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²⁴此即就「宇宙」影響「作家」的角度來談，指出長期流寓的經歷是造就杜甫「善陳時事」的原因。另一方面，宋人又在早期「詩史」說所拈出的國族大事和個人事跡這兩個基本的面向之外，繼續開出了諸如關懷物價等一般社會事實的面向。

其一，「反映時事」說是宋人普遍的看法。此處需說明的是，與詠史詩之「史」為過去之歷史不同，「詩史」說在建構之初就強調這種「史」的當下性，亦即「時事」。繼孟啟後宋代最早提及「詩史」的是宋祁（998-1061），《新唐書·杜甫傳》即在「時事」這一點上對杜詩的「詩史」特質作了確認：「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²⁵前引潘鏞亦如是說。又如李樸（1063-1127）〈與楊宣德書〉云：「唐人稱子美詩為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²⁶此亦就早期「詩史」說所關懷的「時事」一點而展開。

其二，「個人經歷」說或「以詩為傳」說，即以詩歌作為個人事跡的記錄。事實上在《本事詩》中即已形成了「他傳」與「自傳」二種傾向。其中孟啟重點闡釋的是前者，在前引《本事詩·高逸》關於「詩史」的那段文字之前，其實完全是在談李白而非杜甫，杜甫懷李白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幾可視作一篇李白的個人簡傳，在孟啟看來這樣的作品纔是典型的「詩史」。承繼此一闡釋取向之餘，宋人在杜詩中又進一步尋繹出杜甫為其他

²⁴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後集，卷15，頁112。

²⁵ 宋·歐陽修、宋祁著：《新唐書》第1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738。

²⁶ 宋·李樸：〈與楊宣德書〉，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6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178。

人作「傳」的情形，如魏泰（生卒年不詳）《臨漢隱居詩話》卷一載：「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²⁷這則材料所引詩句出自杜甫的〈八哀詩·故司徒李公光弼〉，亦可視作杜甫為李光弼(708-764)所撰的一篇簡「傳」。從「非但敘塵跡摭故實而已」的論斷來看，魏泰和孟啟一樣認定這種類似「傳」的作品纔是典型的「詩史」。再回到《本事詩》中，與孟啟大書杜甫以「詩」為「他傳」形成鮮明對照，《本事詩》中透露杜甫以「詩」為「自傳」的傾向，實僅僅能從「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這寥寥數語中窺出消息而已。宋人的開拓，是在這一方面又進一步確認了杜甫以「詩」為「自傳」的情形，如胡宗愈（1029-1094）〈成都草堂詩碑序〉云：「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²⁸其在確認杜甫以詩志己的同時，進而提出讀其詩可以知其世的論點。

其三，以上兩者外，宋人又開展出了一種「記錄一般社會事實」說。宋人發現杜詩中也記錄了一些當世一般的、尋常的社會事實——多數是正史所不載的社會、經濟、醫療、物質等方面的史料，他們將其視同信史。陳岩肖（生卒年不詳，約1138-1166在世）《庚溪詩話》卷上指出杜甫詩歌時常記載各地物產，且皆有據依：「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無有貴賤，亦時見於吟詠。」²⁹另外，宋人似乎又對杜詩中記錄的唐代物價饒有興趣，³⁰認為這類詩亦可冠以「詩史」。如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一載杜詩記錄唐代酒價的軼事：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歡浹，談笑無間。忽問：「塵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錢。」上喜曰：「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³¹

²⁷ 宋·魏泰著，陳應鸞校注：《臨漢隱居詩話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318。

²⁸ 宋·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收入唐·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第12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頁6589。

²⁹ 宋·陳岩肖：《庚溪詩話》，收入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67。

³⁰ 宋人對此有諸多討論，參見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41-46。

³¹ 宋·釋文瑩著，鄭世剛等點校：《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

又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提到杜詩記載唐代川中鹽價的問題，並認為其可作為信史來看待：「子美〈鹽井詩〉：『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便見當時川中鹽價與商賈所販之息，使後世有考焉，真詩史也。」³²此亦反映出宋人信任（確切說是崇拜）杜甫，將其詩視同信史的心態。

2. 對「事」本身的探求與考證

宋人對「事」的看重，不僅表現於對「事」的影響力之確認，以及對「事」的具體種類之拓展，亦表現於對「事」本身的探求與考證。這在宋代汗牛充棟的杜集注本中得到了集中反映（此處不贅），宋人的詩話中亦見不少考辨。宋人對於鉤沉爬梳杜詩中這種具體的「一時事」甚為關心，具體例證極多，但情形大同小異。茲舉一例，如蔡居厚（?-1125）扶發杜甫〈行次昭陵〉中「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一聯的本事云：「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潼關，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以為賊，賊以為官軍，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內前石馬皆汗流。子美詩所謂『玉衣晨自舉，鐵馬汗長趨』，蓋紀此事也。」³³

以上一、二點合論之，無論國家時事、個人事跡還是其他一般的社會事實，「詩史」說本質上所要揭示的就是「事實」或「現實」二字，是故宋人對「事」之具體所指煞費心思，孜孜探求。詩人以詩記錄並反映事實，是為「實錄」。宋人將「詩史」與「實錄」聯結起來，如王得臣（1036-1116）《塵史》卷中載：「予以謂世稱杜子美為『詩史』，蓋實錄也。」³⁴再者，這些「實錄」的作品往往存在著文本上的特定標記，亦即年月、地理、數字、人物等，宋人又將有這些標記的杜詩作品稱作「詩史」，如姚寬（1105-1162）《西溪叢語》卷上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³⁵當然，「實錄」在中國文化的語境本身傾向於褒義，但在宋代「詩史」說的具體接受中也產生了一些弊病（主要涉及「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階段，詳後）。

3. 「詩史」說的價值導向

早期「詩史」說確認了國族大事的決定性地位，從而使得「詩史」說先天帶有一種價值論色彩，充滿道德關懷甚至審判的意味，又由於這種國族大事通常是負面之事，故在艱危之世，「詩史」說能以道德的力量去召喚有識之士以詩歌記錄、表現國族大事和個人遭

³² 宋·朱翌注，朱凱等整理：《猗覺寮雜記》，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3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頁38。

³³ 宋·胡子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7，頁43。

³⁴ 宋·王得臣著，黃純艷整理：《塵史》，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頁44-45。

³⁵ 宋·姚寬著，湯勤福等整理：《西溪叢語》，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4編第7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頁36。

際。所以從這一層認識出發，這種被塗上某種價值色彩的「宇宙」，影響「作家」後必然會引發其創作上的改變。與杜甫面對安史之亂的情形相似，宋末的詩人亦處於艱危之世。他們一方面追憶和歌頌杜甫，一方面也用自己的詩作記錄國家大事，於是像汪元量（1241-1317？）等人亦被賦予了「詩史」的稱號。不過這裡遇到的闡釋困境是，正如劉若愚自己所承認，屬於第一階段的形上理論、屬於第二階段的表現理論和屬於第四階段的實用理論，因使用概念上的重合，存在容易混淆的情形。³⁶具言之，具有價值論色彩的「詩史」說可謂某種「道」的顯示，這是第一階段的問題；進入第二階段，這種「詩史」說則是個體特質的一種顯現；進入第四階段，這種「詩史」說又成為了一種宣揚「道」的工具，由此具備了實用的價值。由於劉氏闡釋模式存在上述的糾纏，為更突出這一方面的論述，筆者將在後文相關部分中對此予以集中探討。

4. 「情」的發顯

早期「詩史」說由於強調了「作家」面對「宇宙」的「能動性」，遂又會帶出抒情的问题，不過這在《本事詩》的論述中表現得十分模稜。但聯繫整部《本事詩》來看，「情」卻是孟啟甚為關心的一個面向。³⁷宋人在這方面也作了一些探討，如張戒（生卒年不詳，1125年進士）評杜詩〈可歎〉詩云：「觀子美此篇，古今詩人，焉得不伏下風乎？忠義之氣，愛君憂國之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之不足，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其詞氣能如此。恨世無孔子，不列於《國風》、《雅》、《頌》爾。」³⁸張戒是在說杜甫之所以能創作出如此動人的作品，原因就在於其飽含一腔忠君憂國之情。優秀的詩歌作品必定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杜詩中這些堪稱「詩史」的作品，其價值不僅僅只是記錄事實而已，同時也包蘊著作者真摯的情感，故所謂「詩史」，本質上都是「有情的歷史」。那些被稱作「詩史」的作品之所以仍然是「詩」而不是「史」，正是「情」的作用在背後支撐運作——無論這種「情」是功利的還是無關心的。另需說明的是，與前一小節遇到的闡釋困境相同，「情」的問題同時牽涉到一、二、四階段，故主要的論述將在後文相關部分展開。不過，宋人（尤其是在宋末之前）在「情」方面的論述總體看來較為統一，亦即趨向一種外向的家國主義的「情」而不是內面的個人主義的「情」。

³⁶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248。

³⁷ 廖師棟標認為：孟啟的「詩情」說正是陸機「緣情」說、鍾嶸《詩品序》以來的繼續。參見廖棟標：〈試論孟啟《本事詩》〉，《中外文學》第23卷第4期（1994年9月），頁176-178。

³⁸ 宋·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189。

(二) 從「作家」與「作品」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按劉氏的闡釋模型，這一階段主要談「作家」創造「作品」的情形。宋人在這一方面用力頗深，總的情形是：一方面延承早期「詩史」說在技巧理論層面的關懷並作深入探討；另一方面，對早期「詩史」說未曾涉及到的表現理論，宋人有了自己的思考。當然，與前文論述《本事詩》的情形類似，所謂第二階段的技巧理論與第三階段的審美理論實為一體兩面的關係，它可能既是「作家」自覺的藝術行為，也可能是「讀者」總結的審美經驗，但兩者畢竟共享著同一個「作品」，關聯甚密，所以這裡仍以「作品」為中心將審美理論統合至技巧論來討論。

1. 表現理論層面的拓荒

早期「詩史」說涉及到了技巧理論的問題，但技巧是具體可感的，是可以被標記的。在這一階段中，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技巧之上的問題，它是抽象的、僅貯存在觀念層次的，這就是表現理論的問題。具體在中國文論的語境來看，即諸如「詩言志」或「詩緣情」等說法，亦即從藝術主體即「作家」出發來說明「作品」表現思想情感之特徵的問題。這一點《本事詩》未曾涉及，宋人對此作了一些思考。惠洪（1071-1128？）《冷齋夜話》卷三載：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³⁹

上述論述直承曹丕（187-226）「文以氣為主」之說法，劉若愚認為這是一種傾向個人主義的表現理論，其「著重個人的性格甚於普遍的人類情感」。⁴⁰也就是說，惠洪認為杜詩之有「詩史」之譽，這是他個人氣質才賦的表現。其又特別拈出「誠實」二字，意在說明杜甫表現的個人情志是誠摯、真實而不是虛偽、造作的。這便超越了早期「詩史」說單純從表象的技巧理論著眼之不足，由此深化了「詩史」說的理論內蘊。

2. 技巧理論層面的深度開展

³⁹ 宋·惠洪著，黃寶華整理：《冷齋夜話》，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第9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42。

⁴⁰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141。

早期「詩史」說表露出對「如何陳於詩」即敘事藝術問題的關懷，宋人承繼這一趨向，又以長於敘事作為杜詩「詩史」性質的主要表現，如蔡居厚云：「子美善敘述，故號詩史。」⁴¹宋人圍繞敘事藝術的問題進行了相當熱烈的討論。

其一，從用事的角度確認杜詩的「詩史」性質。以杜甫擅長用事是宋人的普遍看法，如張戒云：「詩以用事為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⁴²當時各種杜集注本皆以考證杜詩用事為風尚。而姚寬《西溪叢語》卷上引《劉貢父詩話》，更將杜甫擅長用事的特徵與其作品的「詩史」性質扭合在一起：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鄼侯，非也。」按：蕭何為主吏掾，即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為不知？杜謂之詩史，未嘗誤用事。⁴³

其二，從字句鍛煉的角度探求杜詩的「詩史」性質。如俞成（生卒年不詳，約 1150 年前後在世）〈校證草堂詩箋跋〉云：「誠知草堂先生煉句下字，往往超詣，續之則不似，增之則不然，庚之和之，果何為哉……惟是理到，不容加點，古今詩史，一人而已。」⁴⁴當然這裡的「詩史」只是一般意義的概念。由於「敘」是為「事」服務的，杜甫煉字煉句之目的即是要在精煉的字句中表現出更為豐富、深廣的事義。趙與時（1175-1231）《賓退錄》對此有精闢論述：「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州軍，能說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為妙。」⁴⁵

其三，從格律的角度闡發杜詩的「詩史」性質。《本事詩》未嘗提到「詩史」與格律的關聯，但唐代已有人關注到杜甫在律詩上的成就，如元稹（779-831）〈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評杜律云：「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⁴⁶前引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說「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其中「律切精深」之說顯然承自元稹。然

⁴¹ 宋·蔡居厚：《蔡寬夫詩話》，收入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393。

⁴² 宋·張戒著，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頁16。

⁴³ 宋·姚寬著，湯勤福等整理：《西溪叢語》，頁35。

⁴⁴ 宋·俞成：〈校證草堂詩箋跋〉，收入唐·杜甫著，蕭滌非主編：《杜甫全集校注》第12冊，頁6609。

⁴⁵ 宋·趙與時著，姜漢椿整理：《賓退錄》，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所編：《全宋筆記》第6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頁139。

⁴⁶ 唐·元稹著，冀勤校點：《元稹集（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691。

筆者以為，在「詩史」說中，格律只是配合事義的手段，屬於敘事藝術的一個工具，其之有無實無傷大體，只不過在杜甫這裡，格律這一點顯得特別突出罷了。質言之，宋祁之論的真實語意應是：「善陳時事」是「詩史」的必要條件，「律切精深」只是充分條件。

其四，從文體的角度推斷杜詩的「詩史」性質。陶宗儀（1329-1412？）《輟耕錄》卷六十七引南宋初僧釋普聞（生卒年不詳）之語：「老杜之詩，備於眾體，是為詩史。近世所論：東坡長於古韻，豪逸大度；魯直長於律詩，老健超邁；荊公長於絕句，閑暇清曠；其各一家也。」⁴⁷但其並未揭示出兩者之間的具體邏輯關聯，此僅為宋代杜詩學一般議題的發顯而已。前引宋祁似乎又特別凸顯出排律一體，與釋普聞的邏輯恰好相反（當然這裡的「體」兼有體裁和風格之義），但他們都沒有道清個中的具體關聯，不過總的來說宋人在這個問題上本即談得很有限（此一點恰是後來好為辨體的明人的主要興趣）。然「詩史」究竟是否與具體詩體存有內在關聯，學界對此仍有爭議。⁴⁸

其五，早期「詩史」說即已透露出其與《春秋》筆法的內在聯結，宋人亦在此一點上演繹出許多識見。如黃庭堅（1045-1105）〈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之詩〉頸聯寫道：「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⁴⁹「史筆」即撰寫史書的筆法。張暉先生認為「史筆」在這裡存有兩義，一是強調「史筆可以保存歷史的是非」，二是史筆對於史書存在裝飾的作用。⁵⁰上述這種看法在南宋更成為關注的焦點。如周輝（1126-？）《清波雜誌》卷十載：

輝復考少陵詩史，專賦梅纔二篇，因他汎及者固多。取專賦，略汎及，則所得甚鮮；若併取之，又有疑焉，叩於汝陰李遐年，李曰：「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於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如『巡簷索笑』、『滿枝斷腸』、『健步移遠梅』之句至今宗之以為故事，其可遐遺？非少陵，則取專賦可也。」⁵¹

這裡透過李遐年（生卒年不詳）的說法，指出杜詩善用「以一字寓褒貶」的《春秋》筆法。從《本事詩》到黃庭堅，雖都暗指「詩史」說與《春秋》筆法的關聯，但都未正面點出，最早點出兩者關聯的是這則材料。此外，許顥（1091-？）《彥周詩話》、楊萬里（1127-1206）

⁴⁷ 元·陶宗儀：《輟耕錄》，卷67，收入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426-1427。

⁴⁸ 如龔鵬程先生認為「詩史」一詞在形式上指涉意義不明，它不代表文類，而只代表價值觀念。參見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年），頁19-27。

⁴⁹ 宋·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正集卷18，頁1287。

⁵⁰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48。

⁵¹ 宋·周輝著，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455-456。

《誠齋詩話》、黃徹（1093-1168）《碧溪詩話》、劉克莊（1093-1168）《後村詩話》中對此皆各有陳義，茲不贅舉。但需瞭解的是，宋人形成此一點關懷的背景是《春秋》學在宋代成為了顯學。⁵²另需提出的是，宋人在關注「詩史」說與《春秋》的關聯之外，也開始將其與另一部著名史書即《史記》聯結起來。需知，《本事詩》中「推見至隱，殆無遺事」一語正是出自《史記》。與《春秋》微言大義、微婉顯晦的書法不同，《史記》一方面以直筆著稱，號以「實錄」；一方面又透過「太史公曰」的論贊之體，在正文之外抒發作者情感、寓以褒貶。宋人常將杜甫與司馬遷（前 145-？），或將杜詩與《史記》對照並提，其中最有趣的是蘇軾（1037-1101）以「荔枝似江瑤柱」喻「杜甫似司馬遷」之說，⁵³後來楊萬里在〈江西宗派詩序〉中闡明個中真意云：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無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無然也。非無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無然也，形焉而已矣。⁵⁴

從楊萬里的闡釋來看，蘇軾是從風味上找出了杜詩與《史記》相似的閱讀感受。但關於杜詩與《史記》之關係的討論似乎僅在宋代曇花一現，後世的討論仍以杜詩與《春秋》之關係為主。

（三）從「作品」與「讀者」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宋人在「作品」與「讀者」之關係的探討，一方面集中在審美理論的層面，但由於它和技巧理論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為便於敘述且不至為區隔而區隔，已將其整併至前節中論述。另一方面，除對「作品」具體可感的層面進行反應外，「讀者」透過這些「作品」，亦與「作家」即杜甫的心靈發生接觸，從而再度嘗試捕捉杜甫對「宇宙」的反應，亦即以「作品」為中介上溯到了「作家」的個體本身，進而去體認「作家」的個體特質。再一方面，由於「讀者」反應的千差萬別，遂引起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現象，一種限於杜甫自身

⁵² 參見張高評：〈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人文中國學報》第 16 期（2010 年 12 月），頁 55-96。

⁵³ 宋·蘇軾注，孔凡禮整理：《商刻東坡志林》，收入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 1 編第 9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年），頁 177。

⁵⁴ 宋·楊萬里著，辛更儒箋校：《楊萬里集箋校》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3230-3231。

(屬第三階段)，另一種推展至他人(屬第四階段)，本節先談前者。總之，以上二、三方面是宋代「詩史」說在本階段不同於《本事詩》的主要關懷之處，以下試分論之。

1. 對杜甫個體特質的期待及過分期待

經由「作品」的中介，宋人得以再度確認杜甫的個體特質，亦即從關懷「作品」的特質進至關懷「作家」的特質。這使得宋人對杜甫的個體特質賦予了各種期待，其中最鮮明的是對杜甫忠君愛國之心的歎賞。如惠洪《冷齋夜話》卷二言：「〈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⁵⁵但這是對杜甫總體性的討論，並未與「詩史」結合。張暉先生考證出明確將二者結合論述的是南宋的于奩(生卒年不詳)，其在慶元三年(1198)所作的〈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中談到：「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于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前鏗金振玉之所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⁵⁶于奩認為杜詩之所以被尊為「詩史」，並不在於格律、句法等具體藝術層面，而是根柢於杜甫個人的「忠義」之心。此外，宋人對杜甫個體特質的體認還廣泛表現於藝術技巧、學養才力等層面，這些已陸續在前文揭示，不再贅言。需說明的是，形成以上現象的大背景是杜甫經典地位在宋代確立，由是引發了杜詩學前所未有的昌盛景象。也正由於這種情形，宋人對杜甫的期待不時越過了事實的邏輯，這種過分的期待進而形成了一種盲目的崇拜。

一種顯著的情形是將杜詩全然等同於信史，如前引酒價、鹽價之例。正因為盲目認同杜詩的史料價值或「實錄」精神，一些宋人甚至認為杜詩記載的事物都是精確無誤的，著名的例子是沈括(1031-1095)曾質疑杜甫〈古柏行〉中記載的柏樹尺寸有問題，而黃朝英(生卒年不詳，紹聖後舉子)則堅信杜甫不會出錯，事見《靖康緬素雜記》：

沈存中《筆談》云：「〈武侯廟柏〉詩：『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予謂存中善《九章算術》，獨於此為誤，何也？四十圍若以古制論之，當有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頭指相合為一圍，則一圍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柏，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又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老杜號為詩史，何肯妄為云云也……而存中之說誤也。⁵⁷

⁵⁵ 宋·惠洪著，黃寶華整理：《冷齋夜話》，頁38。

⁵⁶ 宋·于奩：〈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收入明·楊慎編，劉琳等點校：《全蜀藝文志》(北京：線裝書局，2003年)，卷39，頁1207。

⁵⁷ 宋·黃朝英著，吳企明點校：《靖康緬素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

這則材料顯示，沈括作為一個有著科學精神的學者，其錯誤在於忽略了生活的真實跟藝術的真實之間的區隔；而黃朝英作為杜甫的擁躉者，其以老杜號為「詩史」故絕不會犯錯。由此反映出部分宋人對杜甫的非理性崇拜以及對「實錄」精神的曲解。

還有一種顯著的情形是在藝術表現方面，即認定杜詩「字字有來處」。江西詩派重視字句鍛煉，如黃庭堅認為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⁵⁸史繩祖（生卒年不詳，1241 在世）更說：「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無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⁵⁹這種「無一字無來處」、「字字有證據」的說法顯然是極盡誇張的說法。

當然，回頭檢視宋人圍繞杜甫而展開的「詩史」說的熱烈討論，這種熱烈討論本身就是一種崇拜的行為，淺見洋二先生曾描摹宋人面對杜甫時的心態道：「對宋人來說，杜甫是無法面對的存在。宋人談到杜甫時，不得不經常面對杜甫本人早已不在的事實，為了銘記他昔日的存在，獻給杜甫及其詩作的稱號就是『詩史』。這一稱號不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人的這種心態嗎？」⁶⁰

2. 「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一種情形

狹義的「詩史」是指杜詩中記錄或反映事實的那部分作品。後來「詩史」的使用不斷泛化，到宋人這裡衍生為兩種情形：一種是以「詩史」作為杜甫或者全部杜詩的代稱；另一種是以「詩史」稱頌其他詩人及其作品。前一種當視作「讀者」透過「作品」對「作家」的認知，屬第三階段；後一種則進入了第四階段，應視作「讀者」對「宇宙」的反應，已轉入一種實用性的層面。這裡先探討前一種情形。

以「詩史」代稱杜甫或杜詩的情形在宋代極為普遍。如前引史繩祖之論中的「詩史」即代指全部杜詩。以「詩史」代指杜甫的情況則如孔傳〈雲林石譜序〉：「予嘗聞之：詩史有『水落魚龍夜』之句，蓋嘗遊湘鄉之山，魚龍蟄土，化而為石，工部固嘗形容於詩矣。」⁶¹另宋人編訂杜集時，便多以「詩史」為名。⁶²然張暉先生認為「這部分文獻內涵明確，沒有理論意義」。⁶³筆者則以為這部分文獻仍具一定意義，因為一方面這是宋代「讀者」之「反應」的一個有機部分，是宋人將「詩史」說泛化使用的一種拓變；另一方面，以「詩

⁵⁸ 宋·黃庭堅著，劉琳等校點：《黃庭堅全集》，正集卷18，頁475。

⁵⁹ 宋·史繩祖著，湯勤福整理：《學齋佔畢》，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所編：《全宋筆記》第8編第3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頁125。

⁶⁰ 日·淺見洋二著，金程宇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頁349。

⁶¹ 宋·杜綰：《雲林石譜》（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⁶² 如李歐《註詩史》、陳造《韻類詩史》、古郭徐君《詩史字韻》、方醇道《類集詩史》、題為王十朋集註之《王狀元集百家註編年杜陵詩史》、陳禹錫《史註詩史》（又名《杜詩補註》）等。

⁶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33。

史」作為杜甫或杜詩的代稱，也揭示出宋人在對杜甫的接受中所呈現出的重點關懷的面向，同時也反映了宋人對杜甫的崇拜心理。

(四) 從「讀者」與「世界」之關係審視宋代「詩史」說

「讀者」與「世界」之關係是早期「詩史」說基本不曾考量到的面向，這一點留白，正是宋人拓變「詩史」說的一個重要方向。以下試從三方面申說之。

1. 「詩史」的政教色彩與實用意義

按劉氏的闡釋模型，此一階段是在談「讀者」閱讀「作品」後對「宇宙」之反應的問題，他的基本立場是「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⁶⁴故其運用的結果會呈現出一種「實用性」。這種充滿價值論色彩的功利主義觀念在宋代非常盛行，如李綱（1083-1140）〈讀四家詩選四首·其一 子美〉詩云：

杜陵老布衣，饑走半天下。作詩千萬篇，一一千教化。是時唐室卑，四海事戎馬。愛君憂國心，憤發幾悲吒。孤忠無與施，但以佳句寫。風騷到屈宋，麗則凌鮑謝。筆端籠萬物，天地入陶冶。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使居孔氏門，寧復稱賜也。殘膏與剩馥，沾足沽丐者。嗚呼詩人師，萬世誰為亞。⁶⁵

李綱認為杜詩之被稱為「詩史」的緣由，在於它具有「足繼風雅」的教化意義，這顯然是一種受到儒家價值觀念影響的論斷。類似的看法在宋代不少，總體而言愈到南宋，人們對杜甫的人格修養方面愈加關注。一些論者更以極端性的筆調凸顯杜詩堪有與三百篇相似的教化意義，如王十朋（1112-1171）〈謁杜工部祠文〉誇張地推崇道：「風雅頌息，嗣之者誰？後代風騷，先生主之！」⁶⁶這種充滿政治色彩與教化意義的實用性觀念，是早期「詩史」說未曾關懷到的面向，可謂宋人的一大拓變。而宋人之所以關懷這一點，「乃是因為他們正視到『詩史』中具有一種重要之精神，此即藉詩以褒貶之功能」，⁶⁷這顯示出宋人將「詩史」觀念實用化的傾向。

2. 「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

⁶⁴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277。

⁶⁵ 宋·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上冊（長沙：嶽麓書社，2004 年），頁 97。

⁶⁶ 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頁 36。

⁶⁷ 陳文華：《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頁 254。

前文已陸續作出揭示，「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是將這一稱號運用在杜甫以外的詩人。「詩史」的內涵在此種情形下已脫離了杜甫，而升華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具有普適性的觀念，這是宋人的另一種拓變。王楙（1151-1213）首次將「詩史」的名號賦予他人——白居易（772-846），《野客叢書》卷二十七「白樂天詩紀歲時」條載：「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⁶⁸這種泛化使用的現象在宋末達到了高潮，原因仍與「詩史」說的初發內涵相關，亦即時局的變化引發「作家」情志的變化，因而他們以詩的形式去記錄或反映現實。宋末的情形與安史之亂相似，許多有識之士廣泛接受「詩史」的觀念，故當時不少名位不顯的詩人也被賦予了「詩史」稱號，如周月潭（生卒年不詳）、潘少白（生卒年不詳）等。其中汪元量更被李鈺（生卒年不詳）推為宋末「詩史」的主要代表：

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愁歎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歎歎而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也。唐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抑鬱，不可復伸，則又有甚于草堂者也。⁶⁹

李鈺所論雖有溢美之嫌，但其稱「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正與《本事詩》呈現的唐人賦予杜甫「詩史」稱號的情境類似，同時又從「事」和「敘」亦即思想性和文學性兩方面對其作出了定性。可以說這是「詩史」說在宋代泛化使用的最顯著實例。

需說明的是，這種情形與「詩史」的政教意義並非在同一層次上展現出「實用性」。前者是劉氏所強調的得到儒家讚許的價值觀念；後者則頗為複雜，這些被授予「詩史」之稱號者，既有像李鈺所揄揚的汪元量這樣契合儒家價值的詩人，也有像王楙從日常化寫作的角度來認定的白居易這樣的詩人，這兩種情形顯然不能一概而論，其中後一種明顯溢出了劉氏所定義的「實用理論」。因此，根據宋人泛化使用「詩史」的實際情形，本文所定義的「實用理論」，在劉氏所謂「文學是達到政治、社會、道德，或教育目的的手段」之外，兼具一種一般性的、無價值色彩的「實用性」——在這種情形下，無論「詩史」是指一種觀念還是具體的詩人或作品，它都可以在不同價值體系中展現出不同的「實用性」，如此宋人的上述拓變也得以在整個闡釋框架中有條不紊地各安其位。

⁶⁸ 宋·王楙著，鄭明等校點：《野客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399。

⁶⁹ 宋·汪元量著，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87。

3. 宋代「詩史」說之「批評的理論批評」

宋人在第四階段拓變的另一面向，是建立了對「詩史」說的「批評的理論批評」。劉氏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將文學研究分為「文學的研究」和「文學批評的研究」兩大面向，各自又下轄四種層級。⁷⁰張暉先生曾指出歷代「詩史」主要關涉的是「文學的研究」中的「文學批評」和「文學批評的研究」中的「批評的批評」，而宋人多數的「詩史」說主要還是屬於「文學批評的研究」下屬的「批評的批評」之「批評的實際批評」。⁷¹這部分「批評的實際批評」可以由其具體情形的不同歸入到藝術構造的四階段中。至於「批評的理論批評」部分，已從個別升華至一般，即從杜甫擴展至其他被賦予「詩史」稱號的人那裡，從而脫去具體的、個別的質性，升華稱為一般的、普遍的觀念，故應將其納入「讀者」對「宇宙」的反應這一階段中來審視。關於「詩史」說的「批評的理論批評」，當以邵雍（1011-1077）的〈詩史吟〉為代表：「史筆善記事，長於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增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於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⁷²作為理學家的邵雍所關懷的，已不是「詩史」說所具體代表的事件及其表現技巧，而是指向更為抽象、更高層面的本體論的面向，亦即要強調「真」的重要性——詩歌要「記載隱藏在這些事件、人物背後的普遍意義」，張暉先生視邵雍的這種「詩史」說為「追求普遍性」的詩學。⁷³

綜上所述，宋代「詩史」說的內涵極為豐富，對於早期「詩史」說既有敷演的部分，更有拓變的一面，總體呈現出全面展開之勢，標誌著「詩史」說的成熟。至此，「詩史」說真正在中國古典文論中據有了一席之地。

四、結語

劉若愚在艾布拉姆斯的基礎上，重新設計了一個所謂適於中國文論的闡釋模型，即以「宇宙」、「作家」、「作品」、「讀者」四個要素為端點，組成一個動態循環的闡釋系統，並以四要素之間的關係分別作為藝術構造的四個過程，進而以此模型分析中國的文論。這一

⁷⁰ 劉若愚先生將文學研究分為以下幾個層級。一、文學的研究：A.文學史；B.文學批評（1.理論批評：a.文學本論 b.文學分論；2.實際批評：a.闡釋 b.評價）。二、文學批評研究：A.文學批評史；B.批評的批評（1.批評的理論批評：a.批評本論 b.批評分論；2.批評的實際批評：a.闡釋 b.評價）。參見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1-3。

⁷¹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7。

⁷² 宋·邵雍著，郭或整理：《邵雍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 18，頁 483-484。

⁷³ 張暉：《中國「詩史」傳統（修訂版）》，頁 38-41。

模型為吾人重新審視古老的「詩史」說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觀看視角。經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幾點認識：

其一，在《本事詩》關於「詩史」說惜墨如金的論述中，卻涵括了關涉文藝作品之各種情形的全部四個要素，且其對四要素之間的邏輯關係的言說也具有極強的自洽性，這充分顯示出了「詩史」說在發生之初便自具一種縝密周延的理論品格。此一點提醒吾人：不宜低估《本事詩》中的這則材料的複雜性（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們常僅視其為「詩史」說的雛形），事實上「詩史」說的基型在《本事詩》的寥寥數語中即已定調，後世豐富的「詩史」說或沿著《本事詩》確立的基型開枝散葉、深植根柢，或尋繹其間的理論縫隙而在主幹上生長出粗細不一的「側枝」，但始終未曾偏離《本事詩》設定的初始方向。重新正確認識《本事詩》這則材料的價值，有利於正本清源，從源頭上釐清「詩史」說的發展脈絡。

其二，在四個藝術構造階段中，《本事詩》所明顯涉及的是前三個階段（即「宇宙」與「作家」、「作家」與「作品」、「作品」與「讀者」）。其中第一階段是《本事詩》關懷的最主要面向，從《本事詩》中「詩史」說建構的邏輯鏈環來看，「事」是引發後續連鎖反應以至於最後建構出「詩史」這樣一種觀念的邏輯起點，由此也奠定了「事」在「詩史」說中的核心地位。而第二階段的論述，又開出了後世「詩史」說關於「敘」的面向關注。至於第三階段的論述，則提示吾人「詩史」說實為一種出於「讀者」的期待而建構起來的觀念。

其三，《本事詩》完成了「詩史」說的基型建構，稍後的宋人在此基礎上對四個階段皆展開了深度敷演與有力拓變，具言之：宋人延承早期「詩史」說以第一階段為基本關懷的理路，再度確認了「事」的核心地位，又拓展細分了「事」的具體類別、對「事」本身進行孜孜考證，同時也對「詩史」說的價值導向和「情」的問題展開思考。宋人在第二階段的敷演和拓變，一方面表現在補足了早期「詩史」說未曾涉足的表現理論，一方面又從用事、煉字煉句、格律、文體、《春秋》筆法等諸面向對技巧理論進行深入探討。在第三階段，宋人在對「詩史」說的審美理論進行總結的同時，又開出了關懷杜甫個體特質的面向（並產生了過分期待的情形），此外還衍生出了「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一種情形，即以「詩史」作為杜甫或杜詩的代稱。至於早期「詩史」說未曾明顯關涉到的第四階段，宋人一方面闡發「詩史」的政教意義，使之成為一種契合儒家價值的理論；一方面衍生出「詩史」說泛化使用的第二種情形，即將「詩史」稱號賦於杜甫以外的詩人；除卻上述這些「批評的具體批評」，宋人還對「詩史」說進行了超越具體形相的思考，開出了「詩史」說「批評的理論批評」之面向。宋人對於「詩史」說的多元探討，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詩學議題，而是與宋代的杜詩學、公羊學等學問的開展密切相關，同時與宋代關注現實人生、推崇道德關懷、強調學問功力、趨向日常寫作的文藝思潮息息相通。從這個意義上說，「詩史」

說在宋代的興起，實因其深契一代之思想觀念與藝術趣向，「詩史」亦可視作窺探宋代文藝思潮的一個關鍵詞。

其四，「詩史」說在《本事詩》中完成了基型建構，但直到宋人手中才真正走向成熟，並由此獲得了躋身中國古典文論之基本議題的可能。儘管宋人居功至偉，如其開出的《春秋》筆法與「知人論世」兩點在後來成為了明清學人討論「詩史」的核心面向，但早期「詩史」說所牽連出來的諸如「賦比興」手法、「詩史」與詩體之關係等問題在此際仍未展開，亦即早期「詩史」說所遺留的諸多「不確定域」正俟望明清學人的抉發與闡釋。是知，「詩史」說的生長與完形仍是進行式。本文對「詩史」說在初發的唐宋階段的條分縷析，或能起到舉一反三、以少總多的效用；宋以降紛繁的「詩史」說亦可參酌本文的分析，使之能在劉氏提供的理解或闡釋框架中各安其位而生一統緒，其間賡續或新變的部分亦能據此一眼覷定，進而有助於吾人對「詩史」說的整體演變及其理論特質形成一種體系化的認識。

劉若愚在《中國文學理論》的結語中援引韋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提倡的展望主義（Perspectivism），指出「我們應該對一部文學作品參考它本身之時代的價值，以及在它之後各時期的價值」。⁷⁴文學作品如此，文學理論亦然。「詩史」之所以在唐宋以降成為詩家學人熱烈討論的公共話題，除了本文開篇提出的「詩史」說的描述策略在《本事詩》那裡開始發生了突破，更重要的是「詩史」說在孕穗之初即持論極高，其後更是愈發與現實人生、家國脈動深度嵌合在一起，從而為身處歷史漩流中的知識分子指出向上一路。劉氏這一闡釋框架可以為吾人揭示的，正是「詩史」這一優良的胚胎，如何一步步分裂細胞、形成血肉、搏動心跳的奇妙歷程。

⁷⁴ 美·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頁 294。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司馬遷 SIMA, QIAN:《史記》*Historical Records*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年)。
- 南朝梁·沈約 SHEN, YUE:《宋書》*Song Annals*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4 年)。
- 唐·元稹 YUAN, ZHEN 著, 冀勤 JI, QIN 校點:《元稹集(修訂本)》*Collected Works of Yuan Zh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年)。
- 唐·杜甫 DU, FU 著, 蕭滌非 XIAO, DI-FEI 主編:《杜甫全集校注》*Complete Works of Du Fu*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年)。
- 唐·孟啟 MENG, QI:《本事詩》*Ben Shi Shi*, 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Remarks on Poetry Through the Ages: The Second Series of Collectio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年)。
- 宋·于旻 YU, TAI:〈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Records on Renovation of Du Fu's Former Residence in Dongtun, Kuizhou”, 收入明·楊慎 YANG, SHEN 編, 劉琳 LIU, LIN 等點校:《全蜀藝文志》*Art History of the Entire Shu* (北京 Beijing: 線裝書局 Thread-Binding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3 年)。
- 宋·王十朋 WANG, SHI-PENG:《梅溪王先生文集》*Collected Works of Wang Shi-Peng*, 收入張元濟 ZHANG, YUAN-JI 主編:《四部叢刊續編》*A Continuation of Collectanea of the Four Categories* (上海 Shanghai: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4 年)。
- 宋·王得臣 WANG, DE-CHEN 著, 黃純艷 HUANG, CHUN-YAN 整理:《塵史》*Zhu Shi*, 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等主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 1 編第 10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2003 年)。
- 宋·王楙 WANG, MAO 著, 鄭明 ZHENG, MING 等校點:《野客叢書》*Ye Ke Cong S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1 年)。
- 宋·史繩祖 SHI, SHEN-ZU 著, 湯勤福 TANG, QIN-FU 整理:《學齋佔畢》*Xue Zhai Zhan Bi*, 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所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Offic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 8 編第 3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 2017 年)。

- 宋·朱翌 ZHU, YI 著，朱凱 ZHU, KAI 等整理：《猗覺寮雜記》*Yi Jue Liao Za Ji*，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等主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 3 編第 10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8 年）。
- 宋·杜綰 DU, WAN：《雲林石譜》*Yun Lin Shi P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年）。
- 宋·李綱 LI, GANG 著，王瑞明 WANG, RUI-MING 點校：《李綱全集》*Complete Works of Li Gang*（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 Lu Publishing House，2004 年）。
- 宋·李樸 LI, PU：〈與楊宣德書〉“Letter to Yang Xuan-De”，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宋詩話全編》*Complete Remarks on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8 年）。
- 宋·汪元量 WANG, YUAN-LIANG 著，孔凡禮 KONG, FAN-LI 輯校：《增訂湖山類稿》*Zeng Ding Hu Shan Lei Ga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 年）。
- 宋·邵雍 SHAO, YONG 著，郭彧 GUO, YU 整理：《邵雍集》*Collected Works of Shao Yo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 年）。
- 宋·周輝 ZHOU, HUI 著，劉永翔 LIU, YONG-XIANG 校注：《清波雜誌校注》*Qing Bo Za Zhi Jiao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4 年）。
- 宋·胡子 HU, ZI 纂集，廖德明 LIAO, DE-MING 校點：《苕溪漁隱叢話》*Tiao Xi Yu Yin Cong Hua*（北京 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62 年）。
- 宋·姚寬 YAO, KUAN 著，湯勤福 TANG, QIN-FU 等整理：《西溪叢語》*Xi Xi Cong Yu*，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等主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 4 編第 7 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8 年）。
- 宋·陳岩肖 CHEN, YAN-XIAO：《庚溪詩話》*Geng Xi Shi Hua*，收入丁福保 DING, FU-BAO 輯：《歷代詩話續編》*Remarks on Poetry Through the Ages: The Second Series of Collectio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3 年）。
- 宋·張戒 ZHANG, JIE 著，陳應鸞 CHEN, YING-LUAN 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Sui Han Tang Shi Hua Jiao Jian*（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2000 年）。
- 宋·黃庭堅 HUANG, TING-JIAN 著，劉琳 LIU, LIN 等校點：《黃庭堅全集》*Complete Works of Huang Ting-Jian*（成都 Chengdu：四川大學出版社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2001 年）。
- 宋·黃朝英 HUANG, CHAO-YING 著，吳企明 WU, QI-MING 點校：《靖康緬素雜記》*Jin Kang Xiang Su Za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6 年）。

- 宋·惠洪 HUI-HONG 著，黃寶華 HUANG, BAO-HUA 整理：《冷齋夜話》*Leng Zhai Ye Hua*，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等主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2編第9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6年）。
- 宋·楊萬里 YANG, WAN-LI 著，辛更儒 XIN, GENG-RU 箋校：《楊萬里集箋校》*Collected Works of Yang Wan-L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2007年）。
- 宋·趙與時 ZHAO, YU-SHI 著，姜漢椿 JIANG, HAN-CHUN 整理：《賓退錄》*Bin Tui Lu*，收入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Ancient Books Collection Offic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6編第10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13年）。
- 宋·蔡居厚 CAI, JU-HOU：《蔡寬夫詩話》*Cai Kuan Fu's Remarks on Poetry*，收入郭紹虞 GUO, SHAO-YU 輯：《宋詩話輯佚》*Collection of Lost Remarks on Poetry of the Song Dynasty*（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0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撰：《新唐書》*A New History of the Tang*（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75年）。
- 宋·魏泰 WEI, TAI 著，陳應鸞 CHEN, YING-LUAN 校注：《臨漢隱居詩話校注》*Lin Han Yin Ju Shi Hua Jiao Zhu*（成都 Chengdu：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2001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孔凡禮 KONG, FAN-LI 整理：《商刻東坡志林》*Shang Ke Dong Po Zhi Lin*，收入朱易安 ZHU, YI-AN 等主編：《全宋筆記》*Complete Notes of the Song Dynasty* 第1編第9冊（鄭州 Zhengzhou：大象出版社 Elephant Press，2003年）。
- 宋·釋文瑩 SHI, WEN-YING 著，鄭世剛 ZHENG, SHI-GANG 等點校：《玉壺清話》*Yu Hu Qing Hua*（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4年）。
- 元·陶宗儀 TAO, ZONG-YI：《輟耕錄》*Chuo Geng Lu*，收入吳文治 WU, WEN-ZHI 主編：《宋詩話全編》*Song Shi Hua Quan Bian*（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8年）。

近人論著

- 王運熙 WANG, YUN-XI、楊明 YANG, MING：《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隋唐五代卷》*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Sui-Tang and Five Dynasties Volume)*（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6年）。
- 吳懷東 WU, HUAI-DONG：〈《本事詩》「詩史」說與中晚唐學術脈動〉“The Theory of Poet Historian in *Ben Shi Shi* and the Academic Pulse in the Middle and the Late Tang Dynasty”，《文史哲》

-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8 年第 4 期 (2018 年 7 月), 頁 140-151。DOI: 10.16346/j.cnki.37-1101/c.2018.04.11。
- 汪湧豪 WANG, YONG-HAO:《中國文學批評範疇及其體系》*The Category and System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
- 郭紹虞 GUO, SHAO-YU 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Selection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年)。
- 陳文華 CHEN, WEN-HUA:《杜甫傳記唐宋資料考辨》*Textual Research on Du Fu's Biographie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臺北 Taipei: 文史哲出版社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7 年)。
- 陳尚君 CHEN, SHANG-JUN:〈《本事詩》作者孟啟家世生平考〉“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amily Life of *Ben Shi Shi*'s Author Meng Qi”, 收於項楚 XIANG, CHU 主編:《新國學》*New Guo Xue* 第 6 卷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 2006 年), 頁 1-17。
- 張高評 CHANG, KAO-PING:〈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以宋代詩話筆記之詮釋為核心〉“Du Fu's *Shi Shi* and *Chun Qiu Shu Fa*: The Annotation of *Shi Hua* and *Bi Ji* in the Song Dynasty as the Core”, 《人文中國學報》*Sino-Humanitas* 第 16 期 (2010 年 12 月), 頁 55-96。
- 張暉 ZHANG, HUI:《無聲無光集》*Wu Sheng Wu Guang J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年)。
- 張暉 ZHANG, HUI:《中國「詩史」傳統 (修訂版)》*Poetry as History: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年)。
- 程杰 CHENG, JIE:《北宋詩文革新研究》*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of Poems and Prose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臺北 Taipei: 文津出版社 Wen Jin Publishing House, 1996 年)。
- 楊松年 YEO, SONG-NIAN:《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Collection of Essays on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Criticism* (香港 Hongkong: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1987 年)。
- 廖棟樑 LIAO, TUNG-LIANG:〈試論孟啟《本事詩》〉“On Meng Qi's *Ben Shi Shi*”, 《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第 23 卷第 4 期 (1994 年 9 月), 頁 176-178。DOI: 10.6637/CWLQ.1994.23(4).172-184。
- 廖棟樑 LIAO, TUNG-LIANG:《倫理·歷史·藝術: 古代楚辭學的建構》*Ethics, History and Arts: A Construction of Pre-Modern Chuci Studies* (臺北 Taipei: 里仁書局 Le Jin BKS, 2008 年)。
- 劉文剛 LIU, WEN-GANG:《杜甫學史》*The Research History of Du Fu* (成都 Chengdu: 巴蜀書社 Ba Shu Shu She, 2012 年)。
- 韓經太 HAN, JING-TAI:〈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向〉“The Interpretative Inten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中國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99 年第 3 期 (1999 年 5 月), 頁 169-172。

- 龔方琴 GONG, FANG-QIN:〈重讀《本事詩》「李白」條——試論與杜甫相關的若干問題〉“Rereading Li Bai item in *Ben Shi Shi*”,《杜甫研究學刊》*Journal of Du Fu Studies*, 2010年第4期(2010年11月),頁25-31。
- 龔鵬程 GONG, PENG-CHEN:《詩史本色與妙悟》*Shi Shi Ben Se and Miao W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1986年)。
- 日·內山知也 UCHIYAMA, CHINARI:《隋唐小說研究》*Study on Sui and Tang Novels*(上海 Shanghai: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
- 日·淺見洋二 ASAMI, YOJI 著,金程宇 JIN, CHENG-YU 等譯:《距離與想象——中國詩學的唐宋轉型》*Distance and Imagination—The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Poetics*(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5年)。
- 美·艾布拉姆斯 M. H. Abrams 著,鄺稚牛 LI, ZHI-NIU 等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Critical Traditio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年)。
- 美·劉若愚 JAMES J.Y. LIU 著,杜國清 TU, KUO-CHING 譯:《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0年)。

Construction,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Re-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E, RU-JUN

(Received October 16, 2019 ; Accepted November 10, 2020)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James J.Y. Liu's Chines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ve model, modified from M. H. Abrams's literary theory to be better suited for interpret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re-examining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construction,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alysis shows that all four elements of universe, writer, work, and reader concerning various situations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have been covered in the concise illustration of "Poetry as History" in *Ben Shi Shi (Anecdotal Poems)*. *Ben Shi Shi* clearly refers to the first three of these four stages of artistic development. The first stage, which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ld and the writer,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affairs of the world"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s well accepted by later generations. The second stage, whi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riter and the work, evolves into an emphasis on "narration". And the third st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k and the reader, suggests that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is actually intende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eader. *Ben Shi Shi* contributes to the basic construction of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The subsequent profound elabo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y scholars in Song Dynasty are key for the "Poetry as History" theory to become a basic topic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Poetry as History, Du Fu, *Ben Shi Shi (Anecdotal Poems)*, Tang Dynasty, Song Dynasty, James J. Y. Liu